

学术争鸣

# 大学之道：理念与制度

王建华

**摘 要：**大学的发展可以从理念与制度两个层面进行考查。在大学发展的宏观层面，理念与制度紧密相联，互为支撑，但在大学发展的具体层面上，二者通常又是此消彼涨、螺旋上升的。文章在对大学理念与制度的“互生关系”及其非同步性进行分析后认为：大学的发展是在大学理念与大学制度的相互磨合中实现的；大学理念与大学制度的非同步性是大学发展的真实状态；二者的同步性是大学发展中所矢志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

**关键词：**大学之道；大学理念；大学制度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01)03-0030-05

欧洲中世纪以降，大学成了人类社会最有价值的发明之一。检索这一文化机构近千年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理念与制度始终是其发展的两个定点，二者紧密相联，互为支撑，大学发展的轨迹便是围绕这两个定点以非等距离旋转而成的椭圆。大学发展的椭圆轨道说明，在大学的发展中理念与制度是密不可分的两个层面或说是两条线索，但又是很少同步起作用的，二者之间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此消彼涨的过程。大学的发展有时候是制度强于理念，有时是理念强于制度；或者说在大学的发展中，有时是制度决定理念，有时是理念催生制度；有时是制度赖于理念而存在，有时是理念赖于制度而张扬。当然，大学发展的最终鹄的，或说是最佳状态还是理念与制度的同步运行；只是在达到“同步”的过程中二者之间的不同步是经常出现的。历史发展到今天，理念与制度在大学发展中的不同作用显得更加明显。关于现代大学发展的危机，有人认为是制度出了问题，有人认为是理念没有确立（或说是缺失）。在此基础上，有人提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以确保现代大学永恒的发展；有人则认为应检讨现有的大学理念，重温经典大学理念的理想与神韵，惟如此，才能使得现代大学仍不失为人类的精神家园。面对大学发展之“道”上理念与制度的纷争，进一步从理论上廓清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在大学发展中的作用，将有助于我们今天大学教育的改革。

## 一、大学理念：大学发展的先导与灵魂

有关“大学理念”是近代大学出现以来，研究最为深入的一个领域。在新旧千年交替之时，尤其是在人类“世纪情结”的作用下，有关大学理念的研究更可谓异彩纷呈。在诸多的“大文章”之外，所缺少的，恐怕也是最可贵的，还是一种从“原点”出发的思考，这种思考便是——理念是什么、什么是大学理念。

“理念”一词，不同学科，不同个人有不同的表述，但最根本的一点，理念是形而上的，是富有理想色彩的，但又不是空洞的，而是可以转化为一定的制度，可以对实践起着永恒指导作用的一种理论上的“信仰”。在对“理念”做此种理解的基础上，大学理念又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是由“大学”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大学的特殊性就在于“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由此可以说，大学理念的学术内涵是由“大学”和“理念”二者的学术内涵所决定的。从已有的大学发展史来看，笔者认为，可以对“大学理念”做如下理解：

其一，大学是一个很特殊的场合，如雅斯贝尔斯所言“大学也是一种学校，但是一种特殊的学校”。因此，不能根据词典上有关“理念”的定义，

· 收稿日期：2001-03-26

作者简介：王建华，男，厦门大学高教所硕士生。厦门，361005。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简单地将各大学理念理解为涉及到大学生的理念，这种理解是庸俗的。大学作为一个学者的俱乐部，作为高深学问的研究所，其发展有内在的学术逻辑可循，其理念理应是经典的、永恒的；而不应是平庸的、朝令夕改的。

其二，大学理念应有不同于别种理念的特有的本质，既是大学理念就不应是别的理念。一种理念不能即此又彼，否则大学理念将会因为没有真正的学术内涵而难以指导大学的实践。

其三，大学理念必须与大学制度相联，无法形成与之相应的大学制度，或说没有相应大学制度作支撑的理念不是真正的大学理念，充其量只能称为一种大学教育思想或大学教育思潮。

其四，大学理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时间，不可能今天出现的大学教育理论、教育思想、教育思潮明天就称之为大学理念。这种将大学理念庸俗化的做法是欠妥的，也是不具有科学态度的。

在对大学理念做上述理解的基础上，本文仅就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两条经典理念在大学发展中的作用加以论述。

（一）大学自治。大学自治是西方大学中一个最为悠久的传统。如布鲁贝克所言，西方的大学“无论它的经费来自私人捐赠还是国家补助，也不管它的正式批准是靠教皇训令、皇家特许状，还是国家或省的立法条文，学者行会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sup>[1]</sup>近代大学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大学自治可以说与大学相伴而生，大学自治的根在中世纪。在中世纪，自治是一个十分流行的概念，大学自治算不上是什么特别的，而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但也正因为中世纪是一个自治流行的时代，大学自治对大学的发展反而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在一个“自治的王国”里，失去了自治大学也就失去了它自己。

中世纪是一个黑暗而动荡的时代，各个城市都是自治的，且不断变迁，战争的惟一目的就是掠夺土地。在不断的战争中，各个国家的学者四散奔逃、自由流动，不同国家的学者在自治的城市中为了更好的生存便模仿工商业者结成了自治的行会，而这种行会便是中世纪大学的最初雏形。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学者们的自治理念是大学得以产生的原动力”。当然，这种行会式大学的“自治”也不是一个空洞的词，而是有着丰富的内涵。比如，其最初的自治依靠“罢课、罢教和迁移的权力”得以实现。而后，随着战乱的平息，城市的相对固定，大学要想得到更好的发展，固定校址便成了一个“应然”的选择。大学固定校址以后，原来对自治起保障作用的条件消失了。大学自治理念的实现便需要探索其他新的途径，即构建相应的大学制度以确保大学自治理念的实现。

以相应的大学制度做为大学自治的基础是大学自治理念正式确立的一个标志，而对大学自治理念的确立做出历史性贡献的当数德国人洪堡。

洪堡是一个新人文主义者和自由主义思想家，他在柏林大学筹建期间就撰文提倡大学自治。他说：“国家决不能要求大学直接地和完全地为国家服务”，“国家若染指其中，它只会起阻碍作用”。<sup>[2]</sup>洪堡在1810年的备忘录中更为清楚地表达了这种观点。他说“国家不应把大学看成是高等古典语文学学校或高等专科学校。总的来说，国家决不应指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地联系起来；却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他们的真正使命，则不仅能为政府眼前的利益服务，还会使大学在学术上不断地提高，从而不断地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基地，并且使人力物力得以发挥更大的功用，其成效是远非政府的近前布置所能意料的。”<sup>[3]</sup>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为了使大学自治理念落到实处，洪堡还成立了以讲座教授为主体的教授会，实行教授治校。可以说正是由于洪堡的不懈努力才使得大学自治做为一条经典的大学理念得以最终确立。换言之，也正是由于洪堡在柏林大学确立了“大学自治”的经典理念才使得在德国大学的发展中出现了著名的“洪堡时代”；也正是由于“洪堡时代”的出现，才使得各国大学的发展纷纷取法于德国，最终确立了大学自治这一经典的理念的历史地位。

洪堡以后，因自治而成功的大学更是数不胜数，以国别来分，英、美两国在大学自治上更有发言权，其大学自治的实践也更具说服力，因为其有着与大学自治理念相配套的、专门的、相对完善的大学制度，比如，英国的大学拨款委员会（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大学校长会议；美国的董事会、大学教授协会等。具体而言，英国的牛津、剑桥，美国的“常青藤联盟”，可谓是今日大学自治的典范。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把这些传统大学地位之显赫全部归因于它们自治的传统固然有些牵强或失之偏颇，但我们透过历史的层层密障还是可以辨认出其中存在的某些关联。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八百多年的近乎遗世独立的固执，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牛津、剑桥；同样，如果没有1829年的达特茅斯案的裁定，也不可能有现在的达特茅斯学院，甚至是否存在“常青藤联盟”都很难说。曾经拥有数所著名中世纪传统大学的意大利在大学被全部纳入国家同一规划范围之后，又有哪一所大学能至今风采依然？在法国、德国，今日大学的情形也与意大利相仿。”<sup>[4]</sup>

（二）学术自由。在西方大学发展史上，“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是一对互生的概念，二者的存在互为条件、互为依托。大学自治是学术自由的初始行为，而学术自由则是大学自治的最终鹄的。就

历史而言, 中世纪大学最初是自治的, 但没有学术的自由。这是“因为在当时由罗马教会的最高权力所担保并巩固的‘教会一元化的真理体系’之支配下, 人类的理想只能在教会有权者所设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 任何对正统教义的怀疑和挑战都被视为异端而加以镇压。”<sup>[5]</sup>但若从另一方面考察, 中世纪大学是一个享有诸多特权的自治团体。大学的自治尽可能地为大学免除了来自外界的种种干涉, 从而也为大学开展正常的、自主的研究和教学提供了保障, 使得中世纪大学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能够保持一定的学术独立性, 也使得学者们从事学术研究有一定的自由。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无论如何, ‘学术自由的基础是中世纪欧洲大学奠定的’, 中世纪大学的自治活动, 为后来欧洲的学术自由观念奠定了实践的基础。”<sup>[6]</sup>

将学术自由真正付诸实践的大学是1810年成立的德国柏林大学。正如柏林大学第一任经选举而产生的校长费希特在就职演说中所讲的“这所大学的产生将以建立在近代科学和数学基础上的近代哲学取代欧洲大学许多世纪的亚里士多德的那种权威学说, .....这所大学是以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 以人类进步和人的完善发展, 以自由探索真理为办学宗旨。”另外, 费希特还对学术自由的内涵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他认为学术自由包括两个方面, 即教的自由和学的自由。所谓教的自由就是“教师在专业上享有自由探讨、发现、出版、教授在各自专业领域内所发现的真理, 并且这种自由不受任何限制, 也不听从任何权威的指挥, 任何政治的、党派的、社会的舆论都不得加以干涉.....”。所谓学的自由是指“学生在教授的正确方法的指导下, 在专业学习上要有探讨、怀疑、不赞同和向权威提出批评的自由, 有选择教师学习什么的权利, 在教育管理上有参与评议的权利.....”<sup>[7]</sup>德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 为了确保学术自由的真正实现, 经德国学者们的共同努力, 德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学术自由写入了宪法, 实现了学术自由的法律化。可以说, 正是学术自由理念的确立为德国大学的发展写下了辉煌的一笔。换言之, 也正是德国大学在学术自由上的辉煌成就奠定了学术自由成为经典大学理念的基础。

在现代大学的发展中, 学术自由的存在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学术自由是学术界的要塞”, “大概没有任何打击比压制学术自由更指向高等教育要害了。”<sup>[8]</sup>可以说, 现在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也就是学术研究最为自由的大学。与此同时, 各国在意识到大学学术自由重要性的同时, 纷纷采取相应的制度性措施, 如教授的长期聘任制、成立各类专业协会、教授会等, 以确保大学的学术自由在自己国家里更好地实现。

## 二、大学制度: 大学发展的基础与保障

历史的发展有时是富有戏剧性的, 在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中世纪产生了人类最值得骄傲的发明——大学, 便是一个例证。近代大学是西方社会的产物, 也可以直接说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在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创造与传承文化的机构——大学是必然的, 但是这种文化机构, 或说是大学制度首先出现在西方, 而没有出现在东方一些当时更为发达的地方只能说是由于文化的缘故。不可否认, 在中国及其他的文明古国里很早就产生了富有自身特色的传统高等教育机构, 但是其生命力都极其有限, 无法历时而不衰, 即便如中国古代书院、科举这样极具生命力的高等教育制度也都先后隐入了历史的地表, 不得不让位于一种称之为“University”的西方近代高等教育制度。

近代高等教育的产生与发展可以说是肇始于制度的创新——“University”这一高等教育制度的出现。在这里有两个概念有必要加以区别, 即高等教育与大学。根据台湾有些学者的研究, 在传统意义上“只有大学才是名符其实的高等教育”, 只是到了20世纪, 由于知识的分化、社会的分工、专业意义的扩展、高等教育机构数量的剧增等才使得其原有的含义发生了演变, 即除大学外, 高等教育“还包括学院、技术学院、师范学院和空中大学等”。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出, “大学”还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概念,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大学”这一专门的称谓不是任何时代都有的, 其最初的根源就是中世纪的“University”。

自中世纪始, “University”的出现已历时近千年, 时间的充分性已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种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在某种意义上, 可以说, 大学的产生是始于制度, 而不是理念。大学最初得以生存和发展的不是“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经典理念, 而是得益于“University”这种类似于“行会”的制度。基于这种原因, 才可以说大学制度是大学发展的基础。中世纪以后, 大学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日益繁荣, 且随着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大学中心也发生了与之相似的转移。这其中的原因是诸多的, 但在社会、政治、经济的大背景下, 若从大学制度这一层面进行考查, 同样可以发现一些十分有趣的东西。在制度这一层面上, 大学的发展与大学制度的创新是密不可分的, 哪个国家在现代大学制度方面有了新的举动, 这个国家就很快成了世界高等教育的“马首”。在这方面英国、美国都是极好的例子。

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制度是现代大学发展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保障。但大学制度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在不同层面有不同体现。这里仅从大学理念的角度出发,对大学发展过程中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紧密相关两个大学制度加以分析。

(一) 中介制度。中介制度作为大学制度的组成部分不是从大学产生那一天起就有的,但作为一种缓冲大学与政府之间矛盾的制度,正日益成为大学发展中一种不可缺少的,对大学自治起保障作用的制度。中介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自由市场经济与凯恩斯主义破产以后,一些国家便开始尝试通过社会中介组织加强政府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调控。而将中介制度用于大学管理则是随着大学在社会发展中作用的日益显现而得到重视的。在西方,因为大学有着根深蒂固的自治理念,这种理念的存在使得大学在发展的过程中有着滞后于社会需求的一面。而政府要想使大学能跟上时代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满足当时的社会需要,而又不损害大学的自治权,就只有通过中介来对政府与大学起着一种沟通作用。在大学发展史中,以英国大学的中介制度最为悠久,也最为发达。英国的大学拨款委员会(现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便是一个典型代表。

事实上,中介制度的功能是多样的,除拨款以外,还可以进行评估、审议、监督等。其中高等教育管理中的评估中介制度还有着保障学术自由的功能。原因在于:对高校的评估,必然要牵涉到对高校学术水平的评估,而这种专业化的评估由政府来做无疑是不适合的,有侵害学术自由的嫌疑;而通过由各行专家组成的中介组织来进行就既保证了评估的可信性,又确保了高校的学术自由,在这方面,世界各国都有所尝试,比如法国的“国家评估委员会”(CNE)、荷兰的“高等教育视导团”(IHO)、英国的“学术审计组织”(AAU)、香港的“香港学术评审局”(HKCAN)、澳大利亚的“学术标准专门小组”(ASP)、美国的“高等教育鉴定委员会”等等。

(二) 董事会制度。中世纪的欧洲,高等学校的领导机构有两种:一种是以法国巴黎大学为代表,领导权由教师掌握;另一种以意大利波洛尼亚大学为代表,领导权由学生掌握。在后来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学校规模的扩大、学生的低龄化以及高等学校管理专业化的需要,以波洛尼亚大学为代表的学生管理型大学渐渐淡出了大学发展的主流,而以“学生自治”或“学生治校”的形态存在于各种类型的大学之中。董事会作为一种大学制度最早出现在美国,是美国对世界高等教育制度的一大贡献。正如美国著名高等教育专家鲍德里奇曾经指出“理解校外人士的管理在美国高等院校管理中所起的作用是理解当代美国高等院校管理问题的关键”。美国高等教育

史专家霍大斯塔特也指出:“除了美国和加拿大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的现代大学是由校外人士组成的董事会去制订高等院校的发展政策、聘用或解雇教职人员。这个董事会是使高等教育机构与社会相连接的一个‘中介体’,它意味着美国的高等院校应服务于社会种种目标的机构,而不应当像牛津和剑桥大学那样成为民间的、工联主义的学者独占的领地。那种学校的经办通常完全无视社会的利益,并难以进行自我改造。”

可以说,在董事会制度下,社会各界参与高等教育管理的需要得到了满足,但又不是直接的介入,从而确保了大学的自治。同时,董事会中的院外人士代表了广大的社会利益,他们以广大社会利益的名义对院校的长远发展进行指导,在不侵犯大学学术自由的前提下,又使得大学可免于远离社会的发展,变成由学者独占的、孤立的“象牙之塔”。尤为重要的是,大学的董事会不是政治组织,不直接隶属于任何一届政府或任何一个政党。这就使得大学的董事会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使得大学的日常工作较少地受政治浪潮的直接冲击。同时也使得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明显不受政府控制的自由,为各院校之间在自治和自由的前提下相互激烈的竞争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在与大学理念相关的大学制度中,值得一提还有教授会制度。对于教授会制度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是全国层面的,比如美国的大学教授协会、德国的大学校长会议等。二是具体的、学校层面的,比如各个高校的学术评议会、学术委员会、教授会等,它是一个高校的学术权力机构,在全国层面上,比如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成立就是以保证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为目的的。在具体的、学校层面的教授会、各种评议会、学术委员会等也是为了在一个具体而微的层面上确保大学的学术自由。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就中国而言,20年代的北大、30年代的清华、40年代的西南联大,这些大学之所以能在风雨如晦的岁月中,开创中国大学的历史性辉煌,在学术研究上做出惊人的贡献,其中固然原因众多,但教授会制度在“教授治校”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 三、大学理念与大学制度的相关性分析

从大学发展的实践来看,大学的发展可以明显分为理念与制度两个层面。有些大学是因理念的“精深”而发达;有些大学是因制度的先进而辉煌。

这种非同步性的出现, 不是大学的理念或制度出了什么毛病, 而是大学发展的一种客观规律使然。用哲学上的话讲就是, 事物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 对立总是绝对而持久的, 而统一则是相对而短暂的。就大学理念与制度的相关性而言, 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不同步性是大学发展最终走向理念与制度同步性的不可或缺的基础。

那么, 大学理念与大学制度作为大学发展的两条线索, 在大学的发展中为何经常处于不同步状态呢? 这其中除了哲学上的“不适应——适应——不适应——适应”的规律在起作用外, 从另一角度来看, 一定的理念与一定的制度的非同步性, 其原因还在于理念与制度分属不同的范畴, 很难在理念与制度间建立起必然的一一对应关系, 二者之间更多的是一种相互磨合的关系。简言之, 矛盾是绝对的, 大学也是在大学理念与大学制度的矛盾运动中得到发展。另外, 事物的发展规律也表明, 单方面突破是经常的, 而多方面突破则是偶然的。大学的发展也是一样, 在制度方面取得了突破, 理念方面适当落后是必然的; 同样, 在理念方面取得了突破, 制度方面适当落后也是合理的。归结起来, 对大学发展过程中理念与制度的相关性可以作如下归纳:

其一, 大学发展过程中理念与制度是不可分的。也就是说大学理念必须有一定的大学制度做为支撑, 而做为支撑的大学制度建立以后, 在大学发展的具体过程中是理念还是制度起主导作用则会因时而宜。大学发展史表明, 二者交替起主导作用是符合大学发展规律的。

其二, 大学发展过程中理念总是先于制度出现, 理念是先导, 只有一定的理念才能催生相应的制度。而反过来, 大学制度是大学发展的一种基础保障, 一定大学制度的建立便标志着相应的大学理念的最终确立。同时制度做为一种物质意义的存在, 从而使大学理念的可反复性降低。

其三, 大学理念与大学制度在理论上是紧密关联的, 但在大学发展的实践中, 理念与制度又经常是分别起作用的, 二者之间有一种此消彼涨的关系。这一点是为了强调, 大学的辉煌有时是理念使然, 有时是制度使然, 理念与制度同时起作用的机会和可能性较小。

其四, 大学理念与大学制度在大学发展中的这

种非同步现象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它启示我们, 在大学改革的过程中, 不应双管齐下, 而应从单方面着手, 以减少阻力; 在已有大学制度和大学理念的基础上应先从一方面取得突破, 然后再从另一方面进行突破。

其五, 由于大学理念与大学制度的内在的质的相关性, 实践中的单方面突破会对另一方面起着意想不到的刺激作用, 另一方面会自发地产生相应的变化, 会为下一阶段从另一方面实现突破提供条件。这一点也正是本文主张大学改革应从理念或制度进行单方面突破的主要理论依据所在。

其六, 大学发展过程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大学也是在大学理念与大学制度的矛盾运动中, 在大学理念与大学制度的不断磨合中得到发展。大学发展过程中理念与制度的不同步性是其达到同步的基础和前提。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不同步性是大学发展的真实状态, 大学理念与大学制度的同步性是人们在大学发展过程中所矢志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

(注: 本文中所提到的“高等教育”除特别加以解释外, 都是根据语境与“大学”作对等使用; 文中的“理念”与“制度”两个术语除特别加以解释外, 基本是做对等使用, 即大学制度是指与大学理念相关的制度)

#### 参考文献

- [1] 布鲁贝克·郑继伟等译. 高等教育哲学 [M].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7. 28.
- [2] 转引自·韩延明. 大学理念探析. 厦门大学高教所 2000 届博士论文. 122.
- [3] 贺国庆. 美国和德国高等教育发达史 [M].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8. 46.
- [4] 阎光才. 大学的自治传统 [J]. 读书, 2000, (10), 66.
- [5] 周志宏. 学术自由与大学法 [M]. 台湾蔚理法律出版社, 1989. 11.
- [6] 陈列, 俞天红. 西方学术自由评析 [J]. 高等教育研究, 1994, (2).
- [7] 张宝昆. 人的因素对大学发展的影响 [J]. 外国教育动态, 1988, (1).
- [8] 布鲁贝克·郑继伟等译. 高等教育哲学 [M].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7. 55.

(责任编辑 曾山金)